

# 古代中国人类学思想渊源及融汇路径

王海龙

(广州美术学院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60)

**摘要:**人类学是一门研究文明起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学科。受益于现当代科技发展和思维科学的助推,这门学科在今天的文化和社会科学众研究领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发端并成就于西方,但通过与西方人类学发展史和理论线索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自古就有着非常鲜明的人类学思想发展脉络,在其后西方经典人类学公认各个领域里,我们也都有着可贵且可观的成就。中国古代学者早已关心文明起源及人类文化、文化志和民族研究等很多人类学问题,虽然他们的思考和著作没有冠以人类学的名义,但二者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先哲就从人类文明起源、社会制度形成的角度探讨人类群居、社会化和伦理制度形成等问题。同时,先秦思想家还研讨了原始进化论命题,提出了“天然”“天均”“天择”等思想。中国古代学者在体质人类学和生物人类学思考上也有发展;在语言人类学这一分支上,中国古代学者更是积有成果。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它拥有着大量的民族学、民族志、风俗志和考古学、语言学资源,这些都是研究和整理中国人类学思想发展史的宝贵材源。我们应该总结和梳理这些宝贵的人类学资料并将其发掘出来,以利于今天对人类文明的研究。人类学研究未来的方向应该是中西人类学思想史研究的融汇和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瓶颈,撰写出未来人类学研究新篇章。

**关键词:**古代;中国人类学;思想渊源;融汇;文化志;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 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23)05-0026-11

中国先哲自古关心人类社会起源和历史演进问题。自先秦时代起,众多思想家对人类制度形成、人类道德和伦理规范起源等问题进行过探讨,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的人本主义思想,它对两千年来中国思想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人类学思想发展迅速并影响了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虽然西方人类学学理渊源跟我国古典哲学有异,但二者在对人类文明发生和社会政治制度探源研究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结合西方人类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自先秦时代就开始探讨一些人类学范畴的课题,对诸如人类进化、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社会组织-制度的伦理学意义等都有深入

的研究。同时,中国古代学者也关心华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不同民俗与文化等问题;中国古代积有大量的民族学和民族志史料,在考古学和语言学方面,中国也拥有大量的原始素材和成果。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和思想史做过研究,但在古代人类学思想方面的探讨和论述尚有不足。因而,结合西方现代人类学的观念,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审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这些文献和成果,对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研讨,追溯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发展的源流和形成,这对我们研究中国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和进步、对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和其后人文科学乃至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收稿日期:**2023-02-10

**作者简介:**王海龙,广州美术学院视觉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视觉人类学研究。

## 一、西方人类学思想溯源流变

人类学被尊为 20 世纪的一门显学,它的本质和优势在于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人类学从 19 世纪末异军突起统领西方人学研究,它囊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诸多领域,而且有效地利用了这些学科的综合优势,纵横捭阖文史哲多个闾界,解决了人类文明和文化史研究上的很多问题。在今天,我们几乎在每个现代学科里都能看到人类学的影响;而且人类学开始更广泛地渗透到了科学、人文、社会实践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史前学、语言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到现当代的思想史研究、比较文化研究乃至种族、性别、女权、后现代、影视、环境、未来学甚至人机互动等领域,它都有涉猎并引领潮流,成了一门富有认知和阐释意义的前沿学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艾瑞克·沃尔夫将这门学科定义为“最具科学性的人文学科和最具人文性的科学学科”<sup>[1]</sup>。

人类学既然是西方的显学,若想了解它,追溯一下这门学科的发展史是必要的。我们在了解这门学科的发展史和基本理论后就能更好地把握它,同时也能在研究其发展和成长的基础上将它作为参照系来梳理中国人类学思想的渊源和发展。

在对西方人类学思想史进行溯源时,我们发现它的缘起和兴衰跟西方历史-文明和科学的发展脉络是相对应的;西方人类学思想史暗合了西方文明史的起伏线索,这一学科的发展跟其意识形态的成长有着血脉相通的关联。

究其实,西方人类学作为一门富有影响力的学科,其成长完形于近代。但西方在学术传统上也跟中国传统类似,都有喜欢慎终追远的学风。在对人类学溯源时,西方史学家喜欢把它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将人类学思想溯源到古希腊史学家普罗泰戈拉斯和色诺芬<sup>[2]</sup>,而将“人类学之父”的头衔扣在通常被称作“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头上<sup>[3]</sup>(P4-7)。其实,古希腊虽然有着朴素的人本主义和人类学思想,但它跟后来兴起的人类学理论定义还是有较多差异的。因此,至今很多西方学者对人类学发展源

头是否出自古希腊仍然存疑。学界公认当代作为学科术语的“人类学”在表面上是由希腊语“人类”(ἄνθρωπος anthrōpos,可理解为“人类”或“人性”)和“研究”(λογία-logia)组成的复合词。但词源学家考证,这却是文艺复兴以后才被拼造出来的名称,是个假古董<sup>[4]</sup>。虽然有学者找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有“anthropologos”这个术语,但其又被研究者从词义学上析出它并非今天“人类学”一词的真正语义<sup>[5]</sup>。

虽然有着形形色色的异说,但西方学界公认人类学思想的渊源的确滥觞于古希腊希罗多德和塔西佗著作中对不同文化和种族、地理、语言、民俗及宗教等的描述和比较研究<sup>[6]</sup>。其后,西方文明的发展伴随着东西罗马帝国的裂变和文明冲突,西罗马疆域陷入了千年沉寂和神学统治,东罗马帝国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演练场。这段时期,由于战争、贸易、旅行和宗教活动等,在近东和中东区域,欧洲和亚非地区的民族有着缓慢但持久的接触,这一时期出现了西方公认的著名的阿拉伯思想家和人类学家。其中有早在 10-11 世纪间闻名东西方学界的阿拉伯学者阿布·雷汉·比鲁尼(973-1050),另有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1332-1406)等<sup>[7]</sup>。有趣的是,旅行家和探险家马可·波罗(1254-1324)也被后世史家认为是人类学的一位先驱,甚至赢得了“现代人类学之父”的称号<sup>[8]</sup>。这些学者、探险家、商人和旅行家笔下对东西方不同文明、人种、风俗、语言和宗教等状态的描述向沉闷的中世纪西方展示了一个离奇绚丽的世界,激起了他们了解未知文明和文化的愿望。比马可·波罗稍后的伊本·白图泰(1304-1369)也被尊为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sup>[9]</sup>。白图泰是一位旅行家,他曾从摩洛哥去麦加朝圣,足迹遍布亚非欧几大洲;并游历印度、东南亚、蒙古及中国等 40 余国家和地区,行程 11 万多公里,写过著名的《伊本·白图泰游记》,轰动了东西方世界,也促进了欧洲人对世界地理和人类学知识的理解。

真正孕育西方人类学走向一门现代学科的是文艺复兴和其后的地理大发现。这一时期的航海冒险和科技革命精神刺激了欧洲人“探险”和发现世界的野心,同时也诱发了其殖民主义的思潮。随着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库克船长通过大航海运

动发现美洲以及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等探险亚、非、美、澳及大洋诸岛,欧洲人开始了解以前未知的世界、人种、民族、文化以及世界各地的奇风异俗。这一时期出现大量的笔记、报告、旅行记和各色荒诞离奇的书籍,几乎轰动了西方知识界。它们虽然算不上是人类学著作,但这些书籍的社会影响力极大,它们唤起了学界和思想界比较文化和人类学思想的萌芽,这是现代科学人类学产生的基础<sup>[9]</sup>。

同时,这些迥异于西方的文化类型也激起了哲学家们探讨人类文明起源和比较其类型的哲思,这为西方的启蒙运动吹起了号角。西方学界公认现代人类学是启蒙时代的产物,百科全书学派和中世纪后期兴起的殖民主义思想为其学理定义奠基;而后西方思想史上的浪漫主义运动唤起了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和对其种族、语言、宗教、民俗和文化志研究的重视。在这种积极的背景下,现代人类学已经呼之欲出了。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康德为代表的思想家从哲学发展和人类政治文化发展角度探讨文明路径。康德写出了《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1798)这一著作;同时也出现了以研究比较文明、宗教、神话和风俗语言为职志的爱德华·泰勒、弗雷泽等人类学家,但是由于他们多是从哲学、思维和比较文明等阅读性知识角度去探讨不同文明而缺乏实地田野调查和第一手资料,故他们被后世称为书斋学者和“扶手椅人类学家”<sup>[10]</sup>。

随着上述积极的政治-文化背景,西方的科学革命也对人类学的最后完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19世纪中后期,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异军突起。它不仅仅唤起了一场科学革命,而且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催生了史无前例的进化论运动。人类学继承了进化论思想而蔚为流派,在此基础上,又嬗变出文化传播学派、文化功能学派和其后以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为代表的文化批评学派。至此,人类学学科完成了从近代向现当代思想嬗变的进程。

其后,人类学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一路前行,跟现代其他新学科结合并举,与认知-思维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技和未来学、环境-生态和应用科学等广大学科群广泛结合,并渗透到各个实

践性学科,组合成了一个多元化、跨学科的桥梁和网络,几乎在所有当代学科中都有人类学理念的参与和贡献。人类学在当代世界的成功和发展,对今天研究文化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案例。

## 二、中西人类学思想异源同理

当代人类学在全球的影响几乎无远弗届,它对中国思想和学术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启发。特别在近几十年间,人类学思想从复兴到重新引介,作为一种认知理念和方法论,它影响了现当代众多学科领域,对今天的学界有过很多启迪。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也做出了很多成绩,特别是在比较文化、文化溯源、神话、文学批评、宗教学、民俗学和民族学、艺术学、视觉人类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成绩比较突出。

考其渊源,人类学这一学科乃至其名称虽是一个舶来品,但是它具有对文明研究全方位-综合性的认知、思辨和启发意义;如果我们认真探讨其学理根源及原则,则会发现它的学术主旨和思维方法乃至研究理念跟我国民族文化自自古以来对文明起源、文化本体论和分类学等的探讨研究的目标和内容有共识和暗合。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自先秦以来到近代,中国众多固有的文明文化概念、认知理念乃至研究方法等都跟西方人类学的范畴和目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有必要根据现代人类学的定义和概念来发掘并整理中华文明的人类学思想宝库。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认为中华古代文明虽然对世界有着丰厚的文史哲贡献,但却没有系统的人类学思想。他们在讨论中国人类学发展线索时,往往把中国人类学思想的起源和发端定为20世纪初,认为中国人类学思想是在西方人类学理念被译介到现代中国以后才受其启发而发端的<sup>[11]</sup>。不止西方学者这样认为,过去中国学者基本上也持这种见解。笔者1988年研讨这个课题并出版人类学著作时,曾经涉猎对中国自先秦以来人类学资料的梳理和考索,惜诸种原因这项研究当年未能继续。三十多年来,国内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发展突飞猛

进,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在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研讨和整理方面似仍有较大拓展空间<sup>[13]</sup>。所以,对这个课题应仍有关注的必要。

就学术发展事实而论,中国人类学思想发达于20世纪,但却并不起源于20世纪。自古以来,中国的人类学观念并非一片荒芜的土地。对照前述来简单勾勒西方人类学思想史和其理论发展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几乎在西方人类学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我国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人类学思想实践和理论贡献。人类学是一个西方的学术术语,但人类学思想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国自古不乏比较文化视野和对人类学课题的关注。跟西方人类学发展史和理论线索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自古就有着非常鲜明的人类学思想发展脉络,在其后西方经典人类学公认的各个领域里,我们也都有着可贵且可观的成就。我国从古至今皆不缺乏人类学学科的渊源、资料、理论及成绩;我们缺乏的是按照西方或者国际学界能看得懂的格式和语言来整理我们的成绩并昭示于国际学界。

基于历史、文化、学术界定和语言规范诸种原因,我们很难指望外国学者来为我们梳理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史料或为我们理清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渊源脉络和发展史。这是中国人类学家和文化研究者们自己的任务。诚然,人类学是一个西方学术概念;在学理上,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未必能完全吻合西方人类学的定义和条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去挖掘和建树中华民族人类学思想渊源和理论知识的宝库。不惟此也,如果我们按照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原则来审视,中国古代不仅有着大量的人类学思想渊源的探讨和理论知识,而且还有着大量的史料、实践实录、民族志、地方志和丰富的风土记民俗学资料<sup>[14]</sup>。这些理论和知识是值得总结和整理的,它们就是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滥觞和知识积累的材源和武库。

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众多思想家探讨人类文明起源并有着大量的表述和研究;其后各个时期的思想家也有对人类起源(包括人类生物性基础和文明及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人类文明发端及其思想流变体系和民族志、语言及文字起源等各种现象的探讨。跟西方人类学起源和其各时期人类学

理论发展相比,中国有着一以一以贯之的人类学研究脉络可循——虽然中国古人并没有用“人类学”这个术语来表述(其实,如前所述,在西方古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也并没有人类学这个术语,“anthropology”成为学科名称应是文艺复兴以后才被造出来的假古董)。

人类学号称是研究人的科学,它一般被公认为是西方学科,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在今天它几乎是世界科学和哲学、意识形态的标杆,有着“高大上”的定义、思维框架和影响力。但人类学的起源和发展在西方并不单纯,它跟生物进化论、神学思想斗争;同时也跟各种各样的民族中心主义一直有割不断的关联。在其发展史上它跟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废奴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歧视、平权运动有关。人类学也是多种现代主义思想的理论武库,特别是作为对当代思潮影响极大的“多元文化”“后殖民”和各种“后学”的源头,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梳理。

基于历史和时代原因,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大部分学科发展史的总结和撰著大多迟滞到20世纪初才被近代学者根据西方定义、格式和学理内容进行梳理和编写。有的学科史的总结竟直接是由外国学者始开先河,如中国文学史、中国科技思想史等学科都是由西方人首先撰著<sup>[15]</sup>。但由于民族文化渊源和发展历史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等的内涵、分类和定义标准跟西方概念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按照西方“文学”的定义和标准,我国文学发展并不完全吻合其“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的轨范。在先秦以前的古代中国,文史哲是不分家的,人们很难用今天西方的标准来生硬区分中国先秦文学、历史和哲学书写的分野;中国学者应该更有资格根据自己民族的文学成就来梳理、研究并撰写出自己的中国文学史,并在这方面取得更高成就。近现代以来,中国学人在这些领域做了不少基本的、建设性的工作。比如中国学者撰写了《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美学史》等,达到了世界学坛的最高水平。但是我们对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史的梳理和研究却较欠缺,甚至连初步整理、资料性积累和分析都尚待完成。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人类学思想发展史,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华民族地大物博,是一

个由多民族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它从原始社会、传说时代发展到夏商周和先秦时期,有着不少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积累,也有先贤对这些文明积累的思考 and 探讨。从甲骨文到钟鼎碑铭再到汉隶,从古陶符号到石刻、兽骨龟甲、竹木简编再到丝帛和纸张,中国先民—古人从原始到史前再到文明熹微的各个时代都虔诚地记录并发抒着他们的观察、思考、疑惑和天问。这些都是原始人类学资料。

如果说西方人类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我国人类学的源头或会更古远——从史前社会人类起源到部落文明再到语言和文字起源,古华夏民族跟周边民族甚至其他大洲的人们已经产生了联系和交往。由于生产、交通、游猎、迁徙、战争、婚姻结合和商贸活动,我们的先民跟异民族和其他文明产生了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且更频繁的交往。被后世奉为大哲的先秦诸子对这些文明和文化问题都有过思考和论述,这些无疑可被视为中国人类学思想的源头和先声。此外,中国大量的经典包括早期史书如《春秋三传》《周礼》甚至文学作品《诗经》《楚辞》中都藏贮着大量的原始人类学资料。

如果说希罗多德是西方人类学之父,那中国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和他的一众先辈则无愧于是中国人类学之父。司马迁不只著史而且有着精辟的文化学理论,他不止有理论还有实践。从人类学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司马迁不仅像希罗多德那样有着大量的历史知识和旅行实践,而且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田野工作。同时,他还有着鲜明的民族学思想和比较文化的主张。由于司马迁作为思想家和学者参与了当时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他的人类学理念和民族学思想得以系统地在他的著作《史记》中呈现出来。司马迁是一个有着真知灼见的人类学思想家,早在汉代他就推崇各民族互相尊重、融合统一、反对分裂的思想。他主张民族平等,在其史学著作中开辟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少数民族列传体例以及《货殖列传》等研究不同种族文明和地理、生态、物产及民俗风土的专论,为此后史学和文化研究树立了标准而彪炳千秋。司马迁在远早于西方人类学成型的汉初就在人类学思想方面创设了文化尊重和文化融合——文化

相对主义的理念。其后,自先秦到中华文明发展两千年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中国都有关于中原文明跟国内不同民族乃至国外不同文明交往过程的大量记录、思考和地理、民俗风土、文化志、风俗志方面的著作<sup>[9]</sup>,这些无疑是中国古代人类学学科的珍贵素材和宝库。

不止在文化—社会人类学方面,中国自上古时期就有着大量的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学/史前学方面的文献。在其后历代发展中,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们也在不断充实比较文化、文明认知和不同领域内人类学思想的开拓和发展。除了上述内容,中国先哲也始终关心民族、语言和文化融汇互动课题。中国自古因商贸、军事和民族迁徙等原因一直与域外民族有交往,这也扩大了先哲们的眼界,使得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研究不断壮大而蔚为大观。

### 三、中国先秦及以降之人类学思想发展

作为人类,我们总会好奇并发问人类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的远祖如何走出了动物界?人类祖先何时创造了文明和文化,他们又是怎样记录文明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古代思想家在几千年前就有着同样的疑问。

西方人类学同样也有追溯从其最早先驱到古希腊思想家这类的思考和疑问。希罗多德通过旅行考察不同人种、风俗和文化、制度、宗教来进行比较文化和原始人类学研究<sup>[9](P7-10)</sup>。除了文化研究,古希腊人还继承了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并创造了自己的神话系统来描绘其来源和未知世界。神话就是他们对人类和文明起源最早的、稚拙的解释<sup>[17]</sup>。当然,希罗多德们不可能是最早研究人类学和人类文明起源的学者,这个课题对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过于浩大和复杂,在科学意义的考古学和史前学建立起来以前,古典学者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sup>[18]</sup>。

虽然受到时代和科技的局限,古人不能精确地回答人类起源等终极命题,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根据自己调研的人类不同种族和意识形态知识来探讨诸如宗教和文明发生等重要课题。比如说,在公元

前5世纪,希腊先哲色诺芬就试图探讨动物-人类文明创造和神学等复杂课题:“如果牛和马或狮子有手,并且可以用手绘画或像人一样制作艺术品,那么马描绘的神应该像马,牛的神是牛,它们的神像就是牛马的样子……埃塞俄比亚人会使他们的神祇是矮鼻子的黑种人;色雷斯人的神祇则该是蓝眼睛,红头发”<sup>[19]</sup>(P31-32)。这些希腊先哲的人类学推导虽然朴素,但其中却反映了后来人类学家普遍关心的种族-民族中心主义、宗教理念投射等现代人类学的核心课题。

回顾先秦时代的中国圣贤,那时的文化先驱们也已经在思考人类和文明起源的一些话题。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周易》《易经》《尚书》等皆有关于文明起源的探讨,如“天下文明”“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睿哲文明,温恭永塞”<sup>[20]</sup>。而对于人类学中至关重要的人类社会起源和人与万物区分之探源的主题,先秦思想家也有深刻见解。如关于人类社会跟动物的分野和文明社会之优势方面,墨子有论述曰:“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裤屨,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不纺绩织纆,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sup>[21]</sup>。而杨朱则总结曰:“有生之最灵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杨朱》)<sup>[22]</sup>(P660-661)。著名思想家荀子却认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也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制》)<sup>[23]</sup>(P194)。荀子的论点已经有了严密的辩证法色彩。很显然,动物的自然特征是“群”,但这里荀子讨论的不是自然状态的“群”,他论述的“群”乃文化和社会化的涵义,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

在《非相》篇中,荀子又更进一步论证:“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

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礼”<sup>[23]</sup>(P93)。在这里,荀子已然把“礼”(文化)界定为区分人与禽兽的标志。

先秦思想家并没有止步于抽象地讨论人和文化起源的关系,而是将这种关系有机地纳入社会和政治学的范畴去验证。如孟子将先贤明辨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及文明优势的讨论上升到了政治哲学领域:“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sup>[24]</sup>。这样的论述已经不止是讨论抽象的文化问题,而且将这种讨论引上了人类学的高度。孟子的论点跟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并从社会学角度做了论证。

除了文化和社会学的探讨,先秦思想家也开始对大自然物种嬗替迁衍、生态、环境等皆有探讨和论述,引入了对朴素的进化论思想的研讨。比如庄子在《天下篇》中发问:“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sup>[25]</sup>(P1341-1342)。这里庄子不只是对文明文化发问,也是对自然万事万物和生命起源发问。继而,庄子讨论物种和生物进化嬗变的假说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丁子有尾”,而《列子》等著作也有讨论“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周易》《列子》等书上还讨论“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天瑞》)<sup>[22]</sup>(P15-16)。而庄子则认为“万物皆种也,以不太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为天均”(《寓言篇》)<sup>[25]</sup>(P1088)。上面简单列举的诸子论述其实都已经是深刻的原始进化论课题了。它们不仅讨论了万物的起源,而且讨论了“天然”-“天均”-“天择”;进而引入从“天然”到“天均”乃至自然过渡到了“天择”的理论追寻。

先秦思想家研究物种起源、讨论进化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他们不止是研究自然和未知世界,而是将这种对自然的探讨引入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如庄子

讨论物种原生生命状态“鱼处水则生,人处水而死”,寓意在于对环境的适性为好,无为而治。而以上大多数思想家研究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探讨文明和人类的“种”与“群”的意义:从自然状态到文化状态,强调适者生存的进化观,从而突出呈现了人是社会-文化的动物这个中心主题。这个主题也是其后西方人类学循环往复研究了数个世纪的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课题。

在对上述综合命题探讨的基础上,中国先秦思想家在体质人类学和生物人类学思考上也有发展。虽然史前没有科学的医学和生物知识,但先秦思想家已经开始对生命、人体、阴阳、五行、医药、生态等内容有深入思考,并撰写了大量关于人体的骨骼、血液循环和疾病等方面的医学典籍。中国最早的医学方面的资料可见于甲骨文上的记载,其后学者也提供了许多殷朝武丁时期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活动的记述。

此后,中国古籍《左传》等著作记载了源自阴阳五行学说的原始中医理论对人体和疾病学的研究,并通过总结周秦时代著名医学家医和(人名)及后来的扁鹊等人的医疗实践阐述原始的人体和医学知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特别是其《素问》《灵枢》诸篇讨论了人体结构和解剖、生理、经络及脉学、病因病理、病症及诊断、治疗、预防以及养生等内容——其中有些课题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医学界。这里言及的很多领域都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才被关注的内容。中国人体和医学研究也出现在《山海经》、马王堆帛书医书、《神农本草经》及大量的史-志和专业医学方面的著作中。在古代,医学、巫术、致病原理以及人体和地理民俗等内容往往融混在一起;这里面不止有专业的人体和医疗知识,也有中国古代体质-生物人类学实践的大量资料。这是我们今天整理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渊源时应该留心的。

在人类学的民族志和民俗学研究领域,中国古代也拥有大量文献。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历史并善用记录积累文献的国度。自中国文字记述系统发明以来,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到周朝钟鼎文至先秦两汉的隶书,先贤们不止遗留有大量的伦理和哲学经典论述,而且有着大量的关于民族学-民族

志方面的论述和原始记录。从《易经》《尚书》《春秋三传》《国语》《礼记》《周官》以及其后的《淮南子》《穆天子传》到《山海经》《汲冢书》,先秦及春秋各国族地域和民间都保留了中原王朝正史及其与各异族和边疆民族接触的大量记载。其后,自《史记》《汉书》设固定体例始,几乎历代的史家皆循例记录和描写中华各地少数民族、边疆以及不同文化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等情形。

不仅廿四史中历朝历代有专门的少数民族专志和列传,还有各朝代官修和民间大量撰著的地方志、族谱家谱等皆可资补充;此外,还有大量的古代文人著述和文学作品等内容的补阙,使得中国历史上有关各个民族的历史资料和文化风俗的记录在整个世界文明中堪称完备并值得骄傲,这是研究中华民族人类学史得天独厚的宝藏。

在人类学的另一领域考古学和史前学方面,古代中国的理论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文人自古就有慎终追远和“好古”传统。中国人远在春秋以前就有着浓重的思古研古的传统。从孔子修《春秋》兴灭国继绝世发思古之幽情开始,先秦就有对上古文物的关注。其时对先朝礼乐制度、礼器祭器、服饰建筑、营造家具乃至民俗服饰等都有记录和研究。其后对古物和文物关注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宋朝发展成第一个高峰。宋代出现了系统的考古学名人著作,并对考古学内容有了明确强调和分类,如对上古石刻类、金属类、陶瓷类等都有定有范畴;而具体范畴内再罗列严谨分支:如石刻类又分石经、石碑、墓志、造像和画像石;金属类分贵金属和铜铁,又再细分钟鼎、古钱、度量衡、古印等细目。陶瓷大项又分古陶、砖瓦、模范、明器等专项,每个专项都有大量文献和纪实资料等。除了资料,难能可贵的是,古代学者多能依据实物和摹本并结合文献、活的民俗和历史地理情形去研究和还原实境,努力探讨古物原始现场。这些都成就了中国古代考古学的研发,特别是近代中国接受西方现代考古学理念和技术以后,结合甲骨学等内容研究中国史前文明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sup>[26]</sup>。

在语言人类学这一分支上,中国古代研究家更是积有成果。自古中国学者素重语言本体论研究,从汉代起,古代语言学家就将语言文字作为读书最

基础的“小学”(文字、训诂、音韵)来营奠。从《尔雅》、杨雄《方言》到许慎《说文解字》再到其后历朝历代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学著作,中国有着大量关于语言和文字书写系统的起源、汉字形音义、符号寓意、汉语地理各区方言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著作。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古代不止对汉语研究有着汗牛充栋的语言学著作,对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语言也有着不少记录、分析总结和研究著作。这些语言学的记录和素材是展示不同民族语言发生发展的活化石,它们就是理解不同民族的传说、历史、民俗、宗教和日常生活的某些独特内容的百科全书。在对不同民族语言的记录和研究中,有些优秀的学者还具有分析和比较的视野,他们从不同角度将少数民族语言和其文化传统、民俗、宗教-社会生活等贯串起来进行审视和研究,探讨少数民族的认知、心理、意识形态和其语言携带的不同民族文化观念等,这为各民族间文化的理解、共融和共同福祉架设了桥梁。现代人类学认为,这些不仅是语言史资料,也是理解不同民族认知模式——文化史的宝贵素材<sup>[27]</sup>。

#### 四、中西人类学思想之异同和互补的可能性

中国先贤对人性和人文社会发生学的研究是我国人类学思想渊源的宝库。我们应该怎样总结和梳理这些宝贵的人类学资料并将其发掘出来以利于今天对人类文明的研究呢?

首先,我们对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必须有一种清醒和比较的眼光。对前人的成就我们要认真爬梳分析并辩证地扬弃,既不自尊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诚然,古代中国先贤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思考不可能跟今天西方人类学定义中的范式、学理和内容完全匹配吻合,古代中国人类学思想渊源也不可能跟西方人类学思想完全一致。虽然中西学术渊源不同,但对于人类文明终极探源和福祉的研究的目标是共同的,这正如古人所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学研究文明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和对其基本内涵的坚持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起点和基点。

其次,人类学发端于西方,中国古代虽有类似研究和表述,但因其研究目的、出发点和方法的不同,我们不能对其进行简单类比而做出某些理论中国“古已有之”的判断;而应该根据今天的科学标准进行细致和辩证的研究,以期得出正确的结论。人类学学术史的发展经验证明,探讨文明渊源的方法有多种,既有殊途同归也有异曲同工。中国先哲对中华文明探讨的立足点是植根于华夏民族传统基础上的,这是它的文化血脉,他们致力解决的问题具有着鲜明和深刻的民族特色。

再次,人类学虽然以研究人类文明文化为宗旨,但它毕竟受限于其产生之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某些观点肯定会有着一定的时代、地域、文化甚至阶级的局限。因此在进行比较研究和梳理的时候我们应有清醒的批判和甄别意识。

比如说,在西方人类学发展史上很长一段时间盛行一种白人至上主义观点。在古希腊时代有思想家就认为他们是得天独厚的上帝造物,希罗多德、色诺芬等思想家虽然研究异族,但他们多把其他民族作为低级或劣等种族来进行比较研究<sup>[28]</sup>。这种倾向一直延续至其后很多世纪。在中世纪,虽然西方一直处在政治、经济发展落后的“黑暗世纪一千年”,他们仍然存有这种偏见和优越感。后来的西方学者自认为“欧洲人民的身体状况与创世时最接近,但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由于气候、疾病和繁衍导致其身体状况恶化。这种恶化被认为是造成在非欧洲群体中发现的各种相应文化的原因”<sup>[29]</sup>(P18-19)。

文艺复兴以后,由于科技繁荣和在近现代文明阶段中的先发优势,欧美更是普遍持有一种倨傲的救世主及文化优越心态,这成了他们在大航海时代霸占世界并在全球抢夺殖民地的政治哲学基础。这种思想当然也影响到了此后西方人类学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在19世纪某些人类学家借进化论思想来对人类种族进行诬蔑,为他们侵略乃至霸权宰制制造借口。最有甚者,他们甚至把非洲民族部落人攫获并标上他们乃“猩猩和‘白人’之间‘缺失的环节’”的标签”在欧美动物园笼里展览<sup>[29]</sup>。这是西方借人类学名义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合流的一种极端意识形态表演,是我们必须批判和甄别的。

那么,在总结和比较西方经典人类学演进和中



国古代人类学思想渊源发展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基本原则和内容呢?我们认为,虽然中国和西方文化发展途径有异,文明路径和地理、历史不同,文化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但在人类学思想的发展和进程却有很多文明拓展的共性和可以互资参考借鉴并进行平行研究的可能和必要。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发现,在古代,中西人类学思想发展从思想原则到发展进程乃至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一些可比较和互补的因素。中西古代人类学思想发展研究在以下4个方面有着值得思考的重要内容。

第一,西方人类学发端于古希腊,后经过文艺复兴、人文和地理大发现、启蒙时代后的科技革命而蔚为壮观。观其发展路径,其前期重镇在欧洲,但欧洲本土文明的相对单一性限制了其民族学和文化起源研究的发展。18世纪后对殖民地地区研究的便利使这一学科跃升为研究文明起源和文明类型的显学。19世纪后欧洲本土缺乏人种学和当代原始部族研究资料,其局限性愈益突出,人类学研究遂转场到了材料丰富的原始印第安民族和作为世界移民聚集地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研究是需要地域、种族、复杂-多元文明发展形态等基础的。欧洲中心转为美国中心就是这一态势的呈现。在这种意义上,中华文明在人类学研究上是具有得天独厚的土壤的。

中国地大物博,不止有地域和历史优势,而且有多民族和文化多元的优势。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文明发展有级次的不同,而且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明文化发展形态。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俗、科学、艺术、建筑等方面跟汉族有诸多不同,而且中国各民族的古代学者几千年来一直对这些内容有记述、有研究。中国历史上众多民族的不同文化使之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学研究原生材料;中国人类学发展没有转场断源之虞却有后发优势,这是中国人类学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

第二,中国古代一直有主流文明和次主流及边缘文明间接触和交流的可能,这产生了不同民族交合融汇的条件,也造就了人类学研究的厚实土壤。西方自古希腊的游历、战争、民族融合到“蛮族”入

侵、十字军东征、宗教传播、贸易交流、传教、探险,再到国家鼓动的殖民活动等,这些是催生其人类学研究的历史事件。而早在上古时代,中华大地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域。中原华夏民族成为主流以后,这块土地上仍然繁衍着大量不同的民族,他们通过各种水陆渠道跟其他文明和其他大洲的种族和文化有着初步的交流。这种交流就是中国古代人类学思想产生的基础。随后几千年的各种文化接触使得中原文明和中原周边乃至华夏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文明间互相沟通和了解;同时还通过迁徙、战争、商贸等形式交往互渗。如古代中原的抵抗匈奴战争、促进商贸发展的丝绸之路、中国内部南北方的交通、中央政府对边疆和边缘地区的统治和文化交流以及元朝和清朝对中原的统治和文化融入等等都是促进人类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和动力。

第三,中西人类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不仅是文人学者个体意识形态的反映,而且其形成有相关政府、权威当局的行政介入和制度化参与。在回顾古希腊早期人类学家原始人类学思想形成时,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对其起源贡献甚伟。之后其在中世纪沉寂阶段恢复酝酿,中东和阿拉伯人类学家开始发挥文化使者作用;其后的马可·波罗热唤起了航海热和地理大发现狂潮,各国政府竞相介入。航海家队伍中的文人成了近代人类学家的先驱,他们的身份显然有着官方和半官方的因素;因之,地理发现带来的殖民和其后的人类学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而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家身上也有着行政和制度化的色彩。早期的旅行家、史学家和其后的军事家如司马迁、司马相如乃至征匈奴战将-使节苏武、张骞、班超,史上因其他各种原因跟异族和异质文明交往的蔡文姬等人,佛教传播和译经者中大量的文人、官方代表如郑和及其后的各类近代使节等,都在中国人类学思想发展和史料构建中起到过重大作用。同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近现代的人类学家大多为学者和大学教授,而美国早期人类学倡导者却不乏行政长官等高官,如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1743年起创建了美洲哲学学会,旨在研究当地印第安人<sup>[9]</sup>(P36)。这些政府行政

化的赞助乃至权威人士的介入是西方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它对推动人类学的演进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第四,西方人类学发展史和中国古代人类学发展史上共有的另一个现象是其起源于成熟文明对周边和后起民族(特别是无文字民族)文化风俗及历史等的研究。因此,它葆有相当的记录和实证资料及已发展文明对欠发达文明的观察、调查研究实践和文献资料,包括民族志、考古、语言记录以及视觉资料等,这些都是研究逝去文化和文明的珍贵记录(曾被称作“文化救险”和记录文明演进的“活化石”)<sup>[9]</sup>,特别是很多人类历史上的人种、原始文明和文化社会记录会逝去且永无法复现,因此这些记录和资料不止是研究西方及周边文明文化、中国及受其影响之东亚文化圈的宝贵资源,而且成了研究整个世界文明及多元文化发展的宝库。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人类学研究未来的方向应该是中西人类学思想史研究的融汇和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瓶颈,撰写出未来人类学研究新篇章。

#### 参考文献:

- [1] Wolf, Eric R. *Anthropology*[M].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Inc., 1974. 88.
- [2] Xenophon. *Hiero—A New Translation*[M].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Lewiston, Ralph E. Doty.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3. 11–19.
- [3] Swartz, J. Marc. & Jordan, David K. *Culture: Th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0.
- [4] Birx, H. James (ed.).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Vol. 1) [M].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6. 165.
- [5] Liddell, Henry George & Scott, Robert. *A Greek—English Lexicon*[M]. Oxford, Medford, MA: Clarendon Press, 1940. 265.
- [6] Eriksen, T. Hylland & Nielson, F. Sivert. *A History of Anthropology*[M]. London: Pluto Press, 2001. 1–3.
- [7] Ahmed, Akbar S. Al—Beruni: The First Anthropologist[J].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ewsletter*, 1984, (60): 9–10.
- [8] Rowe, J. Howland. The Renaissance Foundations of Anthropology[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65, 67(1): 1–20.
- [9] Chism, Christine.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endom: Ibn Battuta's Travels in Asia Minor and the North*[A]. Ganim, John M. & Leagssie, Shayne Aaron (ed.).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Middle Ages*[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59–78.
- [10] 王海龙. 遭遇史景迁[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159–170.
- [11] Selby, Henry & Garretson, Lucy. *Cultural Anthropology* [M]. Dubuque, Iowa: Wm. C. Brown Company Publishers, 1981. 7–8.
- [12] Carr, William Keith.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3–10.
- [13] 王海龙. 人类学入门: 文化学理论的深层结构[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9. 122–127.
- [14] 田继周. 先秦民族史[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249.
- [15] Wang, Chi—Chen. *Traditional Literature: Nature and Limitations*[A]. MacNair, Harley F (ed.). *China*[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386–396.
- [16] 晁福林. 先秦民俗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79–199.
- [17] Leeming, David. *Preface: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Mytholog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xi.
- [18] Penniman, T. K. *A Hundred Years of Anthropology*[M]. Duckworth, London: The Chapel River Press, 1935. 24–36.
- [19] Holmes, Lowell D. & Parris, Wayne.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1.
- [20]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37.
- [21] 姜宝昌. 墨子训释[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7. 553.
- [22] 萧登福. 列子古注今译[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90.
- [23] (清)王先谦. 荀子集解[M]. 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24] (清)焦循. 孟子正义[M]. 沈文倬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413.
- [25] 王叔岷. 庄子校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26] Wu, Rukang & Lin, Shenglong. *Chinese Palaeoanthropolog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A]. Wu, Rukang & Olsen, John W. (ed.). *Paleoanthropology and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Inc., 1985. 2–17.
- [27] Silverstein, Michael. Shifters, Linguistic Categories, and Cultural Description[A]. *Meaning in Anthropology*[C]. Albuquerque, New Mexico: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6. 11–56.

- [28] 费孝通.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A].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8. 232-234.
- [29] History of Anthropology[EB/O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anthropology](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anthropology), 2022-10-16.
- [30] Hester, James J. Pioneer Methods in Salvage Anthropology[J].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1968, 41(3): 132-146.

【责任编辑: 周琍】

## A Brief Study on the Origin of Ancient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WANG Hai-long

(Visu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The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60)

**Abstract:** Anthropology investigates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Wester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riginated in ancient Greece and continues to develop into the Present day. Evolving with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advancements in cognitive science, this discipli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al and social studies today. Anthropology originated in the West, but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have long been concerned with many anthropological topics such as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human culture, cultural history, and ethnic studies. This is not a coincidence. As early as the pre-Qin period, Chinese sages discussed primitive societies, socia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ethical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pre-Qin thinkers studied the propositions of primitive evolution, and put forward theories such as “naturalness”, “natural balance”, and “natural selection”.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also conducted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on the environment, biology, medicine and other disciplines. China’s ethnic and geographic diversity generates extensive ethnology, ethnography, folklores, archaeology, and linguistics data. These are valuable sources for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anthropology; source of thoughts; integrate; cultural chronical; comparative studies